

朱謀璋《詩故》研究

林慶彰

一、前言

明代經學，在整個經學史的研究過程中，一直是最受忽視的。近十餘年來，筆者在這領域寫過兩本專著，和多篇論文，^①對明代經學的面貌和特質，也僅能描繪出一輪廓而已。較深入的分析研究，可能要從個別經學專家的研究入手。例如：《易經》有蔡清《易經蒙引》、熊過《周易象旨決錄》、陳士元《易象鉤解》、魏濬《易義古象通》、何楷《古周易訂詁》等。《詩經》有季本《詩說解頤》、朱謀璋《詩故》、馮復京《六家詩名物鈔》、何楷《詩經世本古義》、朱朝瑛《讀詩略記》等。《春秋》有湛若水《春秋正傳》、陸燾《春秋胡氏傳辨疑》、高攀龍《春秋孔義》、朱朝瑛《讀春秋略記》等。《四書》有陳士元《論語類考》、《孟子雜記》等。羣經總義有陳耀文的《經典稽疑》，朱睦㮮《授經圖》等。這些都是明代較有代表性的經學著作，都應有專著或專文加以分析研究。唯有如此細密深入的分析討論，明代經學的真面目才能有效的掌握。能如此，由宋學到清學，其間的演變過程也才能一目了然。在前述十數位專家中，筆者所以先選定朱謀璋《詩故》來研究，理由有二：一是筆者應國立編譯館之

^① 已究成的專書有《豐坊與姚士粦》，東吳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，1978年，未出版。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，臺北，臺灣學生書局，1983年7月。單篇論文，有〈五經大全之修纂及其相關問題探究〉，《中國文哲研究集刊》第1期，1991年3月；〈明代的漢宋學問題〉，《東吳文史學報》第5號，1986年8月；〈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〉，《中國書目季刊》第18卷3期，1984年12月；〈楊慎之經學〉，《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》第18卷2期，1985年12月。

邀所撰寫的《詩經學源流》，明代部分的參考資料最少，非將當時的《詩經》學家逐一研究，無法完成明代部分的撰寫工作。二是就明代《詩經》學的演變來說，明中葉以前，可說是「述朱」的時代。至明中葉，楊慎開拓新的研究方向，從詩句的字義、音韻、名物入手研究，開後代以考證方法研究《詩經》的先導。楊慎對朱子廢《詩序》，說他太「崛強」、「非平心折中之論」。^②朱謀埠的《詩故》則將《詩序》首句恢復過來，以《詩序》首句作為思考、詮釋詩旨的起點。如果朱子廢《詩序》是一種創舉，則謀埠恢復《詩序》，也應該是《詩經》研究另一階段的開始。朱氏的書既有此一深層的意義，自應先加以研究。

二、朱謀埠時代的學術環境

朱謀埠的學術工作，以經學和小學為主，要了解朱氏在明中葉心學彌漫的學術環境中，何以要考校經書，研究小學，就應對當時的學術環境有一概括的了解。

就明代的經學來說，關係盛衰發展的，應該是心學的盛行和科舉考試制度兩個方面。明初科舉考試所用的教材，都是朱學一派的著作，如《四書》主朱子的《四書集注》；《周易》主程頤的《易傳》、朱子的《周易本義》；《尚書》主蔡沈的《書集傳》及古注疏；《詩經》主朱子的《詩集傳》；《春秋》主《左氏》、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三傳及胡安國的《春秋傳》、張洽的《春秋集註》；《禮記》主古注疏。^③明成祖永樂年間修

^② 楊慎說：「程伊川云：《詩小序》是當時國史作，如不作，則孔子亦不能知，如《大序》則非聖人不能作。此言可謂公矣。朱晦菴起千載之下，一以意見，必欲力戰《小序》而勝之，亦可謂崛強哉！」又說：「去《序》言詩，自朱文公始，而文公因呂成公太尊《小序》，遂盡變其說。蓋矯枉過正，非平心折中之論也。」詳見焦竑編：《升菴外集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71年），卷27，頁1。

^③ 參見張廷玉撰：《明史》（臺北：鼎文書局，1975年6月），卷70，〈選舉志〉，頁1694。

《四書》、《五經大全》，取元人經說為底本，元人經說則取自宋人著作。所以仍以朱學派為主導。《大全》修成後，頒到府、州、縣學，作為士人讀書應考的教本。當時考《四書》義和考《五經》的經義，都用八股文。士人為了取巧，往往不讀《大全》，而讀一些專門為考生所編的經書節本，或經書警語，以充實相關知識。至於考八股文的技巧，則熟讀各種八股文範本即可。其次，當時考試規定《五經》僅任選一種，不必全考。士人專習一經，經學知識已相當不足。加上，考生揣摩考官出題的好尚，如有的考官不出變風、變雅，即使專習一經，也僅讀其中一小部分而已。這種風氣主導之下，經學自了無生機。

其次，明代的心學可說是朱學的一種反動。朱學可說是學、行雙修，朱子勸人半天讀書，半天靜坐，即是一明證。可惜，明初的朱子學家僅重視朱學的躬行實踐，而把博學、致知之教逐漸淡忘。久而久之，這些朱學家也成了一羣拘謹、保守、淺陋的「俗儒」。起而改變這種學風的，就是陳獻章和王陽明。陳獻章要人藉靜坐來培養善端，而不重視書本知識，以為書本是古人的糟粕。王陽明承繼陳氏的思想路數，對於書本知識也採取輕視的態度。陳第曾說：「書不必讀，自新會（陳獻章）始也；物不必博，自餘姚（王陽明）始也。」（《謬言》，頁35）可說是兩人為學路向的最佳寫照。當王陽明之學風行天下後，這種不重視書本知識的為學路向，對當時的經學研究，自有負面的影響。^④

由於當時科舉考試制度的偏失和心學家輕視書本知識的態度，對經學研究也有諸多不良的影響：

其一，當時士人僅知道為考試而讀經，一旦取得功名，讀經的誘因已失，能繼續從事經書研究的，可說少之又少。至於讀經的真正目的是什麼，大多數的士人根本無法領會。

^④ 以上參見林慶彰撰：〈晚明經學的復興運動〉一文。

其二，既以朱學派的著作作為考試用書，學者在朱學思考方式的熏染下，所有的著作都僅在闡述朱子學說而已，很難有所突破。

其三，考八股文猶如現在學生考作文，既只考作文，經書的字句就不必一一考訂；心學家講求成聖成德，一切用功皆在「致良知」一事，讀經書也就不必汲汲於草木鳥獸之考辨。由於這兩者的影響，使經書字詞、名物和制度的研究，甚感粗疏。

自明中葉起，像王鏊、楊慎、鄭曉、王道、焦竑、詹景鳳、曹安、陳第等人，對這種經學研究的疏失，即迭有批評。歸納他們批評的意見，和治學方向，大約是：

1. 對心學家空談心性，深致不滿之意。
2. 科舉以八股文來考試，敗壞經學研究風氣。
3. 認為宋學未必優於漢學。
4. 要讀通古籍，必須從字學入手。
5. 注意山川地理之學的研究。
6. 開始從事經典考證，研究文字音義之學。

在上舉的多位學者中，以楊慎和焦竑兩位最值得注意。楊慎是正德、嘉靖朝宰相楊廷和之子，嘉靖三年（1524）因議大禮貶官雲南永昌衛（今雲南省保山縣）。在雲南的四十多年間，著作有兩百多種。他的書一流回國內本土，士人、書坊爭相傳刻，批評正訛者也不少。從他的著作，可以知道楊氏是位非常博洽的學者，上至天文，下至地理，無所不研究。研究的方法，是以考訂取代宋學的議論。他認為「漢世去孔子未遠，傳之人雖劣，其說宜得其真。」又以為宋人的議論出於漢唐的傳注疏釋，漢唐的傳注疏釋傳經學十之六七，宋人的新注傳十之三四。既如此，漢學自有其不可抹殺之價值，為證明漢學之可貴，他開始研究經書中的字詞、音義，以評判漢、宋儒的得失。又覺得要讀通經書，需先從文字、音義入手；因此，他

花了不少功夫研究文字、聲韻之學。文字學類的著作有《說文先訓》、《六書練證》、《六書索隱》、《奇字韻》、《古音複字》、《古音駢字》、《俗言》等七種；聲韻學類有《轉注古音略》、《古音略例》、《古音餘》、《古音附錄》、《古音彙要》、《古音叢目》、《古音拾遺》、《古音後語》等八種。合計十五種。這些書，有的考古音、考字義，有的考通假字、考聯縣字，有的考方言、考俗語。可說是對當時語言、文字的綜合研究。此外，楊慎也重視史事、地理、名物、官制等的考訂研究。在研究地理方面，楊慎除考地名、考水道外，也特別重視《水經》。他認為《水經》是《禹貢》之義疏，《山海經》之補逸。又以爲酈道元的注太過於繁複，遂加以刪削，以桑欽之書單刻流傳。後來，明代學者研究《水經》者日多，楊慎不無啓導之功。

焦竑也博極羣書，他深受楊慎的影響，也從事經書和文字音義的考訂，認為通字學是通經學古的津筏。所作《俗書刊誤》、《筆乘》、《筆乘續集》和《筆乘別集》等書，都可以看出他關心的所在。^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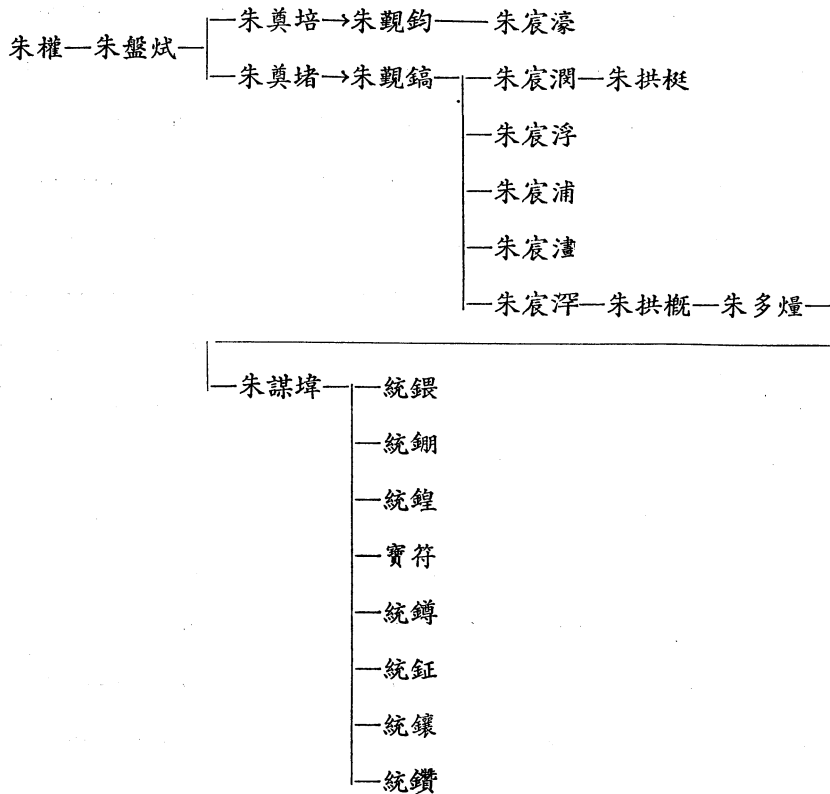
從上文的論述可知，朱謀璋正處於經學興衰轉變的關鍵時刻。在楊慎等前輩學人開拓新學風的引導下，他特別注意經書和小學的研究，想從字句的考訂研究中探求經書的真義，所以他研究《詩經》的書要稱《詩故》。更想從字詞的研究中去探尋它們的原義，因此把他的研究成果叫《駢雅》。至於作《水經注箋》，更是在楊慎尊崇漢學，重視山川、地理雙重因素影響下的自然產物。

三、朱謀璋的生平和著述

朱謀璋是寧獻王朱權的七世孫。寧獻王則是明太祖的第十七子。朱權

^⑤ 以上有關楊慎和焦竑的敘述文字，參見林慶彰撰：《明代考據學研究》第二章和第六章。

本來封於河北大寧，明成祖永樂元年（1403）改封江西南昌。後來朱氏這一支就世世代代住在南昌，到了朱謀璋已是第七世。他們的世系表如下：



這個世系表有幾點可提出討論：

其一，明代宗室子孫的命名，以字排輩，如朱盤焮是「盤」字輩，到了朱謀璋，則是「謀」字輩。同輩的人用同一字統貫，這一共用的字，可說是同輩的共名，一則可統攝同一輩之人，再則可免與非同輩之人相混。個人的私名，按木、火、土、金、水五德的順序來命名，如：朱權的「權」是木，朱盤焮的「焮」是火，朱奠培的「培」是土，朱覲鈞的「鈞」是金，朱宸濂的「濂」是水。五德用盡，再從木開始，所以朱拱樞的「樞」又是木。由於有這麼嚴格的規定，很多偏僻的字也得派上用場，如再不夠

用，就必須造字。

其二，寧獻王的四世孫朱宸濠，就是明代史上有名的「宸濠之亂」的發動人。宸濠在武宗正德十四年（1519）六月起兵造反，聲勢浩大，攻佔九江、安慶，準備奪取南京。王陽明奉命戡亂，帶兵八萬，襲佔宸濠的根據地南昌，宸濠和世子、親信等，皆被擒。自起兵造反至事敗，僅四十三日。所以世系表上，宸濠這一支並無傳人。

朱謀璋，字鬱儀，他的生年，明代相關史料，都沒有記載。^⑥周亮工《書影》說：「豫章朱鬱儀宗侯，博學而無不窺，生嘉靖庚戌之仲冬，今齒已望七。」（頁238）嘉靖庚戌是二十九年（1550）。這是記載謀璋生年唯一的資料，至可寶貴。至於他的卒年，相關史料也不見記載，《明代名人傳》以為卒於西元1624年，^⑦即熹宗天啓四年。如該書所記卒年可信，則謀璋享年七十五。

根據《書影》的記載，謀璋的母親余氏，於嘉靖二十九年（1550）季春生一女兒，剛滿月，又懷了謀璋。余氏整天躺在床上，也不飲食，身體很虛弱，「腹薄而瑩，視之胎可見」。等謀璋生下來，余氏又飲食如常。（頁238）

《諸王宗室列傳》的〈謀璋傳〉說：「璋孝友端直，束修自好，貫串經史，博覽羣籍，通曉朝家典故。明興以來，諸王子孫好學砥行，周藩陸

⑥ 朱謀璋的傳記資料，今可見者有：(1)周亮工撰：《書影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3年），頁238。(2)張廷玉撰：《明史》，卷117，頁3597。(3)錢謙益撰：《列朝詩集小傳》（臺北：世界書局，1961年2月），閩集，頁778，〈寧藩中尉貞靜先生謀璋傳〉。(4)朱謀璋撰：《藩獻記》（杭州：抱經堂書局），卷首，〈錄諸王宗室列傳〉之〈朱謀璋傳〉。(5)謝應鑠重修、曾作舟纂：《南昌府志》（清同治十二年南昌縣學刊本），卷43，人物，頁23，〈朱謀璋傳〉。(6)劉坤一等修、趙之謙等纂：《光緒重修江西通志》（清光緒六年刊本），卷138，南昌府，頁15下，〈朱謀璋傳〉。

⑦ 見 Goodrich 主編：《明代名人傳》（臺北：南天書局，1977年7月影印本），頁345。

擢之後，未有如璋者也。萬曆二十二年（1594）臺議增設石城、宜春管理，命璋以中尉理石城王府事，得劾治不法者，典藩政積三十年，瑾戶讀書，絕綺紈鮮腆之奉。」（《藩獻記》卷首）從這段話可知：（一）謀璋非常潔身自愛，又博通羣籍，除朱睦㮮之外，無人能相比，他的博學很像嘉靖時代的楊慎。（二）他因為通曉皇家典故，所以在萬曆二十二年（1594），被任命管理石城王府，很得宗人的愛戴，持續任事三十年之久。

由於他好學不倦，在過世之前，仍和幾個兒子討論《易經》，至午夜仍不怠倦。是時有「星光火如斗，墜里中，棲鳥皆悲鳴，越二日而逝。」（同上）和出生的故事一樣神奇。當時人給他一個諡號叫「貞靜先生」。有子八人，都「賢而好學」，被稱為八元或八凱。^⑧

他博通羣籍，除經、史、子、集諸書外，又精堪輿之學，《江西通志》說：「於堪輿之說尤精，嘗言祖墓病水，以語諸父兄弟，咸弗信。會羣從暴卒者十餘輩。璋不能忍，遂自發之，墓中果積水若谿澗，諸父始遜謝自咎，別移吉壤。」（卷138，南昌府，頁16）

謀璋的著作，各種文獻，或說：「書百十二種」，^⑨或說：「百二十種」。^⑩惟根據各種資料，能考知書名者，經部有：《易象通》八卷、《書箋》、《詩故》十卷、《禮箋》、《大戴記箋》、《春秋箋》、《魯論箋》、《說文舉要》、《說文質疑》、《六書本原》、《演爾雅》、《宏雅》、《駢雅》七卷、《古文奇字輯解》十二卷、《字原表微》、《古音考》、《七音通軌》、《六國殊語》等二十一種。史部有《天運紹統》二卷、《邃古記》八卷、《藩獻記》四卷、《豫章耆舊傳》三卷、《水經注箋》四十卷、《古今通》、《天寶藏書目錄》一卷等七種。子部

⑧ 見《藩獻記》卷首，〈朱謀璋傳〉。

⑨ 如：(1)《明史》，卷117，頁3597；(2)《藩獻記》卷首，〈朱謀璋傳〉。(3)趙一清撰：《水經注釋》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附錄，卷下，頁21，趙一清按語。

⑩ 如：《欽定大清一統志》（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）卷239，頁25。

有《玄覽》八卷、《異林》十六卷、《金海》一百二十卷、《醫詮》二十二篇、《黃岐鈎玄》三十一篇、《古今通曆》等六種。集部有詩文集《枳園近稿》一種。經史子集合計三十五種。其餘各書名皆已無可考。所以，他的著作到底是一百十二種或一百二十種，已無從印證。今有傳本的，也僅有《詩故》十卷、《六書本原》一卷、《駢雅》七卷、《古文奇字輯解》十二卷、《邃古記》八卷、《藩獻記》四卷、《水經注箋》四十卷、《天寶藏書目錄》一卷等八種而已。

從謀璋的著作，大概可將他的治學方向歸納為下列兩點：

其一，重視漢學和語言文字之學。這可以現存的《詩故》和《駢雅》為代表。《詩故》恢復《詩序》，《駢雅》仿《爾雅》之例，給字詞正確的解釋，對往後漢學的復興和語言文字學的發展，都有推動的作用。

其二，重視山川地理之學：這可以《水經注箋》為代表。明人自楊慎後，校勘《水經》者有黃省曾、柳僉、謝兆申、趙琦美、吳琯、朱之臣、馮舒、夏允彝等人。鍾惺、譚元春也有評點的本子。^⑩可見當時士人對《水經》的重視，謀璋的書是當時《水經注》的最佳箋注本，對清初諸家頗有啟發作用。

本文僅將《詩故》作分析。其他著作的考訂，本人將另作〈朱謀璋著述考〉一文略加考釋。

四、《詩故》的著書動機和體例

從宋末到明中葉的《詩經》研究，可說都是「述朱」的時代。朱子《詩經》學的特點是：(一)廢去《詩序》不錄，但詩旨承襲《詩序》者仍舊不少。(二)以吟詠詩篇本文來探尋詩義。(三)提出淫詩說，彰顯理學家的教化

^⑩ 參鄭德坤撰：《水經注書目錄》、《水經注版本考》二文，收入鄭文氏撰：《中國歷史地理論文集》（香港：中文大學出版社，未標出版年），頁51-101。

觀點。後來，朱子的《詩集傳》成爲官方的教本，也是科舉考試的必備用書。元代和明初的《詩經》著作，如許謙的《詩集傳名物鈔》、劉瑾的《詩傳通釋》、梁益的《詩傳旁通》、朱公遷的《詩經疏義》、劉玉汝的《詩續緒》、梁益的《詩演義》、朱善的《詩解頤》、胡廣的《詩傳大全》等書，可說都是發明朱子《詩集傳》的著作。至嘉靖年間有季本的《詩說解頤》（該書自序署嘉靖丁巳，36年，1557年），於朱說之外，也徵引不少漢、唐之說，並自出新意。隆慶間有李先芳作《讀詩私記》（該書自序署隆慶庚午，4年，1570年），釋詩已逐漸拋棄朱學的束縛，而改從毛《傳》鄭《箋》之說。可見漢學的勢力正與日俱增。但季本、李先芳二書對於被朱子廢棄的《詩序》，仍未敢輕言恢復過來。

在這種學術環境下，朱謀煒爲何要作《詩故》？它的體例又如何，是我們要討論《詩故》之前，應加以了解的。《詩故》的自序說：

說詩者，毛、韓、齊、魯互異，非一傳一說可得而概也。愚者膠其師授，竊竊然自以爲知詩，其用陋且隘矣。予之說，非敢盡詩之用也。將以通夫毛、韓、齊、魯之固也。蓋自束髮誦詩，迄今五十餘年，所見諸家義疏，率多牽於舊說，其于比興之際，微辭妙旨，往往鬱而未章，嘗爲《詩故》一卷，傳之吳中，好事者頗采用其言，乃後知予說之不大乘刺，亦有當於人心矣。爰以暇日研究物理，會通訓詁，集其神明，而酌其得失，三百五篇，篇各爲之說，次爲十卷，仍名之曰《詩故》。雖非告往知來，亦頗發先儒之未發矣。若夫進於溫柔敦厚之教，止於不愚之地，達乎可興可怨之情，以極乎詩之能事，則三百五篇具在，能言詩者自得之，奚俟是哉！^②

從這篇〈序〉，可以知道，謀煒本來有《詩故》一卷，流傳於吳中，當時

^② 朱氏《詩故》自序，作於萬曆37年（1609）。此序除見於明萬曆刊本《詩故》外，又見於朱彝尊撰：《經義考》（京都：中文出版社，1978年8月）卷114，頁4。

人也採用他的說法，讓他覺得自己的觀點「不大乖刺」、「有當於人心」。所以，他把原來的《詩故》擴大成十卷，書名仍舊。他的自序署萬曆三十七年己酉（1609），時謀埠六十歲。

他認為說詩之家有毛、韓、齊、魯之不同，一般人自以為知詩，其實既陋且隘。他所以要作《詩故》，是要「通乎毛、韓、齊、魯之固」，也就是要打破四家詩的偏蔽。至於詩篇的「比興之際」、「微辭妙旨」，由於不是他著書的重點所在，所以並未刻意探究。我們都知道，漢代《詩經》學有今古文之分，齊、魯、韓三家是今文，流行於西漢，都是博士的官學，特重家法，弟子代代遵守此一家法，不敢逾越。所以三家詩間解釋的差異，終漢之世並無溝通的機會。《毛詩》是古文，先為民間之學，至東漢大盛，鄭玄為《毛詩》作《箋》，頗有會通今古文之意。然今古文解釋觀點的差異，恐非鄭玄一人可定其是非。謀埠的理想是藉對本文的理解來論定詩篇的旨意，再由詩旨來斷定詩篇的時代。而非像《詩序》先有一套美刺理論，再將此一理論強加於詩篇之上。由於謀埠的研究方法不牽於舊說，所以頗能發先儒所未發。

至於為何取名《詩故》，《四庫提要》曾加以解釋說：「其曰《詩故》者，考《漢書·藝文志》，《詩》類有《魯故》二十五卷，《齊后氏故》二十卷，《齊孫氏故》二十七卷，《韓故》三十六卷，《毛詩故訓傳》三十卷，顏師古註曰：故者，道其旨意也。謀埠是編，蓋用漢儒之舊名。」（卷16，頁13）這是說，謀埠仿漢人舊名，闡明詩篇旨意叫「故」。《詩故》就是闡明詩篇旨意的書。由於他的書旨在闡明詩篇旨意，前人的說法雖多，但以《詩序》的時代最古，所以他把《詩序》首句錄進來，作為探討詩旨的一種思考基點。這並不代表謀埠全部遵從《詩序》之說，而《四庫提要》卻說：「是書以〈小序〉首句為主。」似乎謀埠全遵〈小序〉首句來說詩，而毫無自己的看法。苟如此，謀埠何必把自己的書叫《詩故》。

這是研究《詩故》時，應先提出說明的一點。

經謀埠擴充後的十卷本《詩故》，今傳板本有：明萬曆刊本、清抄本、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、胡思敬輯《豫章叢書》本。^⑬各本的卷目是：

卷一：周南、召南。

卷二：邶鄘衛。

卷三：王、鄭、齊。

卷四：魏、唐、秦。

卷五：陳、檜、曹、豳。

卷六：小雅鹿鳴至無羊。

卷七：小雅節南山至鼓鐘。

卷八：小雅楚茨至何草不黃。

卷九：大雅。

卷十：周頌、魯頌、商頌。

在《周南》、《邶鄘衛》、《鄭》、《魏》、《唐》、《檜》等風之前，皆有解說文字。如《唐風》云：

唐，堯故都也。周成王以封母弟叔虞，是爲唐侯。叔虞之子燮嗣位，以南有晉水，改國號曰晉。仲尼所錄皆晉事也，必稱唐，存舊封，亦以先王遺風之可尚也。（卷4，頁3-4）

而《召南》、《王》、《齊》、《秦》、《陳》、《曹》、《豳》等七個風和《小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周頌》、《魯頌》、《商頌》等，都沒有說明文字。謀埠大概認爲這幾個類別的詩，其所以命名和地域、時代都很清楚，所以不必解說。

每一首詩僅錄篇名，不錄詩篇本文。篇名之下錄《詩序》首句，偶有

^⑬ 明萬曆刊本，藏於國立中央圖書館和復旦大學圖書館。清抄本有兩種，一種有清王宗炎校並跋，藏於北京圖書館；另一種有丁丙跋，藏於南京圖書館。文淵閣《四庫全書》本，原本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。臺灣商務印書館已有全套影本。另該書局編印《四庫全書珍本》時，也將《詩故》收入第十一輯中。胡思敬《豫章叢書》本，有民國胡元曠的〈校勘記〉，胡思敬的〈校勘續記〉各一卷。

整篇收錄的，如《大雅·雲漢》：「仍叔美宣王也。宣王承厲之烈，內有撥亂之志，遇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欲銷去之，天下喜於王化復行，故美之也。」然後再就首句加以申述或辨正。

其一，贊同《詩序》之說者，則加以申述。此類詩篇，皆以「何以……」、「何……乎」領句。如《召南·江有汜》：「美媵也。何美乎？以其不克與嫡偕行，能待命於國，無貳志也。」（卷1，頁9）

其二，不贊同《詩序》之說者，則提出自己的看法。此類詩篇，大多以「非……也」、「此序非也」、「非此之謂也」領句。如：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：「惡無禮也。非無禮也。嘉其亦猶行古之道也。」（卷1，頁9）又如：《邶風·北風》：「刺虐也。非刺虐也。異姓之臣違亂也。」（卷2，頁6）

再次為謀璋對各篇詩義之申釋，往往按詩句之先後摘句解釋。其間有詩句傳寫訛誤或錯簡者，亦加以辨正；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、朱《傳》有誤者，則訂正其非。偶而也順著詩篇旨意，發揮自己的思想。

以下將分：勘正篇名和詩句之誤、對《詩序》的申釋和批評、糾毛《傳》訓詁之誤、對宋儒詩說的批評、《詩故》所反映的朱氏思想等小節加以申論。

五、勘正篇名和詩句之誤

《詩經》的詩篇，先經口傳階段，流傳數百年；寫定後，又經數百年的傳鈔，篇名、字句有誤，甚或錯簡也是很自然的事。謀璋的《詩故》對這些錯訛字句的勘正，大概可分：勘正詩篇名、勘正詩篇錯簡、勘正詩篇字句等三類，茲分述如下：

（一）勘正詩篇名

《詩經》各詩篇，本無篇名，編詩之人，為引用、檢索方便，各詩篇

皆加以命名，命名的方法，謀埠曾加以分析說：「《詩三百》咸即詩語而名篇，或取諸首。〈關雎〉、〈鵲巢〉之類是也。或取諸終，〈騶虞〉、〈權輿〉之類是也。或即篇中而取之，〈庭燎〉、〈巧言〉之類是也。或即其人與其事而命之，〈巷伯〉、〈賚〉、〈般〉之類是也。」（卷7，頁3）根據這個命名的原則，謀埠以為今傳《詩經》篇名有數篇錯誤：

1.小雅雨无正：謀埠以為：「曰〈雨无正〉者，〈正大夫〉之譌也。此即篇中之語命篇耳。」（卷7，頁3）意思是說：〈雨无正〉這篇是以詩篇中的字詞來命名的，可是詩篇中並無「雨无正」三字，僅有「正大夫」。所以本篇篇名應作「正大夫」。

2.大雅常武：謀埠說：「經文有奮武而無常武，疑字誤耳。」（卷9，頁17）又說：「曰常武者，奮武之譌也。……此即篇中之語命篇耳。」（卷7，頁3）意思是說，〈常武〉這篇也是以詩篇中的字詞命名的，可是篇中並無「常武」二字，僅有「奮武」，本篇篇名應作「奮武」。

3.周頌酌：謀埠以為：「酌即〈內則〉之勺，蓋即鑠字之誤耳。」（卷10，頁10）意思是說：酌就是〈禮記·內則〉的「勺」。而「勺」字因字音與「鑠」相近而誤。且根據詩篇命名原則，本篇有「鑠」而無「勺」，所以篇名應作「鑠」。

謀埠還以為，根據命名的原則，《小雅》有〈小宛〉、〈小弁〉，則《大雅》必有《大宛》、《大弁》之篇，可惜今已亡佚。（卷7，頁3）

（二）勘正詩篇錯簡

古人在帛和紙發明之前，往往將文字寫在竹簡上，將竹簡用絲繩、皮韋編成篇或冊。因典藏時間過久，絲繩、皮韋爛壞，簡冊散開，如重新編串時，稍不留意即有錯簡的可能。很多古書都有這種現象。謀埠認為《詩經》中也有一些錯簡。他斷定錯簡的方法是從章句不倫、內容不類兩方面入手：

甲、章句不倫者：

1.小雅正月：本詩共有十三章，前八章，每章皆八句，後五章，每章皆六句。是以謀埠懷疑第九章以下是錯簡，他說：「此詩『褒姒威之』以上八章，章各八句，語意已盡。『終其永懷』以下五章，疑是錯簡於此，以章皆六句，不倫故也。」本條是以字句長短不相類來斷定詩篇有錯簡。

乙、內容不類者：

1.小雅賓之初筵：本詩共有五章，第二章經文是：「籥舞笙鼓，樂既和奏。烝衍烈祖，以洽百禮。百禮既至，有壬有林。錫爾純嘏，子孫其湛。」謀埠以為這一章是從他詩篡入，他說：「籥舞一章，內有『烝衍烈祖』、『子孫其湛』之語，與射侯、祈爵，似非倫類，疑是〈由儀〉等詩逸篇，因句法偶同竄入于此。」（卷8，頁6）這是以第二章的內容和其他各章不相類而斷定是錯簡。

2.大雅緜：本詩有九章，前八章敘說太王之事，第九章經文是：「虞芮質厥成，文王厥厥生，予曰有疏附，予曰有先後，予曰有奔奏，予曰有御侮。」謀埠以為：「此詩八章，太王之事已具。末又舉文王虞、芮之訟，似不相屬，疑他篇之錯簡。」（卷9，頁3）這是以第九章的內容和前八章不相屬而斷定是錯簡。

（三）勘正詩篇字句

《詩經》各篇字句，在寫定時，今文齊、魯、韓三家與古文《毛詩》即有很大的出入，加上代代傳鈔，更增加不少錯誤。謀埠根據詩句的句法、押韻、事物之理等來勘正詩句之誤，茲舉例如下：

1.邶風凱風：「睨睨黃鳥，載好其音。」謀埠以為：「睨睨，當作睨睨，羽毛光華貌。傳寫之誤也。《韓詩》作簡簡黃鳥，例可推矣。」（卷2，頁3）謀埠根據衍聲複詞的構詞法認為「睨睨」應作「睨睨」。

2.邶風谷風：「昔育恐育鞠，及爾顛覆。」謀埠以為：「昔育字誤，

當曰『昔者恐育鞠』，末章『不念昔者』可證。」（卷2，頁5）這條從上下文的句法斷定「昔育」二字應作「昔者」。

3.唐風葛生：「夏之日，冬之夜。百歲之後，歸於其居。」謀埠以為：「歸於其居，居字與夜不叶，當是舍字之誤。」（卷4，頁7）本條以為「舍」字與「夜」相押，應作「歸於其舍」。這是就押韻與否來斷定詩句之誤。

4.小雅節南山：「節彼南山，有實其猗。」謀埠說：「有實其猗，實字蓋訛，當作『有石其猗』，言山石猗猗，接引登履之人也。」（卷7，頁1）謀埠以為山石猗猗，可接引登履之人。故應作「有石」，而非「有實」。

5.小雅大田：「有滄萋萋，與雨祁祁。」謀埠以為：「與雨，《呂覽》、《漢志》並作『與雲祁祁』，舒徐貌，〈韓奕〉所謂『祁祁如雲』是已。『雨我公田』，則雲者為雨矣。雲可言與，雨則降矣，云『與雨』者誤也。」（卷8，頁3）本條引《呂覽》、《漢志》為證，可說是一種外校法，引〈韓奕〉為證，可說是內校法。就雲、雨之特性，認為「雲可言與，雨則降矣」，則是理校法。

以上各條，並不表示謀埠所校皆正確無誤，但可看出他已能應用各種方法來作校勘，殊為難得。

六、對《詩序》的申釋和批評

《詩故》一書既錄《詩序》首句作為思考的基點，則我們很想知道的是，謀埠是否全採用《詩序》的說法？如果不是，贊同《詩序》的有多少？不贊同的又有多少？能否尋出謀埠所以贊同的理路？或解釋其何以不贊同。

為解決以上幾個問題，最根本的辦法，就是將《詩故》所錄的《詩序》首句，與謀埠本身的說法，加以比對，作成一表，然後再對表中所顯示的現象提出說明。

意見	類別														合計						
	周南	召南	邶	鄘	衛	王	鄭	齊	魏	唐	秦	陳	檜	曹		豳	小雅	大雅	周頌	魯頌	商頌
贊同	7	7	15	7	6	3	7	8	6	6	7	8	2	2	2	44	20	19	2	5	183
不贊同	4	7	4	3	4	7	14	3	1	6	2	2	2	2	4	30	11	12	2	0	120
修正											1				1						2

從上表可以得知，謀璋贊同《詩序》之說者僅 183 篇，佔 60%；不贊同者有 120 篇，佔 39.3%；修正者 2 篇，佔 0.65%。可見謀璋並不全贊同《詩序》首句的說法。既如此，也可見他並不全宗法漢學。這是了解謀璋學術之前，應該先弄清楚的地方。

《詩序》首句既只有一句，且泰半都只有三、五個字，為使讀者能徹底了解詩旨的所在，謀璋於贊同《詩序》之說者，則加以申釋；不贊同或修正者，則加以辨正，並提出自己的看法。茲將謀璋的詮釋、辨證方法舉數例加以說明：

（一）申釋《詩序》之說者

謀璋贊同《詩序》的有 183 篇，對於這些詩篇，他都一概給予較詳細的申釋，如：

1. 周南關雎：「后妃之德也。」謀璋申釋說：

何以言德？廣嬪御厚國本也。國本莫重于嗣續，婦德莫難於不妬，太姒能求庶女於窈窕側陋之間，廣為則百斯男之地，厥德又何加焉？（卷 1，頁 1）

謀璋既贊同《詩序》之說，則后妃必指太姒，太姒之德如何呢？即廣求嬪御以厚國本。所以能廣求嬪御，是因為她有不妬忌的美德。此種美德使她不計較高貴的身分，求淑女於窈窕側陋間。

2. 召南鵲巢：「夫人之德也。」謀璋申釋說：

夫人始來，于何見德乎？于其能將姪娣俱來也。古者諸侯一娶九女，二國媵之以姪娣，是嘗有挾忌心，不與姪娣偕行者矣。此夫人獨能將之，故作者樂歌其事焉。（卷1，頁5-6）

謀埠仍舊順著《詩序》的理路，將夫人之德詳加解說。由於古代國君為多妻制，婦人又善妬，所以當提到女人之德時，都會往不妬這方面思考。《鵲巢》的「夫人之德」，只好解釋為「不妬」了。

3. 王風黍離：「閔宗周也。」謀埠申釋說：

何以閔？閔東遷之失謀也。而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諸侯者，非徒文、武、成、康之德，亦以地勢險固，足食足兵，可以東制諸侯之命耳。幽王雖死驪山，犬戎無盤據豐、鄗之理。乃因一敗，遽爾東遷。有識之士，於其行也，痛悼失圖，故賦此詩。（卷3，頁1）

本篇《詩序》的續申語把「閔宗周」解釋為「閔周室之顛覆」，謀埠不採續申語之說，以為是「閔東周之失謀」。既都同意「閔宗周」之說，何以雙方的詮釋有如此大的不同？這就是因為《詩序》首句語意太過含糊，留給後人太多思考空間所致。

舉此三例，大概已可理解謀埠申釋《詩序》首句之方法。至於他的申釋是否即是《詩序》首句作者的本意，實無法驗證。

（二）反對《詩序》之說者

謀埠反對《詩序》首句之說者，有120篇，對於反對的《詩序》之說，他也都一一加以辨正，並提出自己所認定的正確詩旨，茲舉數例如下：

1. 周南芣苢：「后妃之美也。」謀埠辨正說：

非也。周民室家樂完聚也。無征戍，則民安其業，室家無復離析死亡之憂，所當恤者，產難而已。（卷1，頁4）

謀埠既贊同《二南》是文王之化的詩，作者所處的當然是太平的時代，既如此，自是安居樂業。可是「芣苢」這種植物是「宜懷妊」的，謀埠只好

說，既安居樂業，「所當恤者，產難而已。」亦即教化觀左右了他對詩旨的正確認識。

2. 王風大車：「刺周大夫也。」謀璋辨正說：

非刺周大夫也。商者之婦寄其夫也。周之地狹，民衆多賈，齊、魯、梁、楚，仰機利而逐末業，輕去家室，其妻重于改適，故賦此寄焉。（卷3，頁3）

謀璋大概先認定周地多商人，商人重利輕別離，所以不採《詩序》續申語所說：「禮義陵遲，男女淫奔，故陳古以刺今大夫，不能聽男女之訟焉。」而斷定為「商者之婦寄其夫也。」

3. 小雅沔水：「規宣王也。」謀璋辨正說：

非規宣也。諸侯相戒宗周也。其時蓋有不來朝者，王將起諸侯之師以伐之，受命者賦此以諷諭，將見伐者焉。（卷6，頁10）

謀璋大概受此詩第一章首二句：「沔彼流水，朝宗于海。」的影響，以為此二句比喻諸侯當宗王室，遂附會出一番大道理來。

舉此三例，謀璋辨正《詩序》首句的方法，大概也可窺知一二。現在應提出討論的是，在謀璋不贊同《詩序》之說的各類詩中，以《鄭風》的十三篇和《小雅》的三十篇為最多，何以如此？

就《鄭風》部分來說，謀璋既不贊成《詩序》首句之說，也不步朱子「淫詩」說的後塵，而比較能從詩篇本文去尋繹詩人作詩的本旨，例如：

羔裘：美賢大夫也。

遵大路：賢者以道去周也。

女曰雞鳴：賢夫婦交相警戒之詞也。

丰：志悔恨也。

東門之墀：惜狷介者之遯世也。

子衿：朋友失好者之相責讓也。

出其東門：遯世者答〈東門之墀〉之詞也。

溱洧：志其俗之荒于游觀也。

以上八篇，大抵從詩篇本文探尋而得的詩旨，自不同於《詩序》首句的美刺之說。謀埠所以能在《鄭風》有比較自由的思考空間，主要得力於宋人對「鄭聲淫」的解釋，已先摘除漢人美、刺說的束縛，而開拓出一大片美好的田地。謀埠在此一寬廣的原野中思考，自有超乎尋常的成績。

其次，《小雅》中《詩序》首句認定是刺幽王的詩篇，計有三十四篇之多。謀埠不贊同者，則有二十篇。由此可知，《小雅》中謀埠不贊同《詩序》之說的三十篇，與周幽王有關的，就佔二十篇。謀埠何以不贊同《詩序》的刺幽王之說呢？這可先從謀埠對這些詩篇的解說來加以觀察，如：

谷風：朋友相棄而相怨也。

蓼莪：孝子見放逐者所作也。

鼓鐘：記徐夷偃王僭亂之事也。

甫田：先公勸農之詩也。

大田：農夫答〈甫田〉之詞也。

桑扈：諸侯時見于天子，天子燕之之詞也。

鴛鴦：諸侯答〈桑扈〉之詞也。

頍弁：王者燕親戚諸侯而諸侯歌其事也。

車牽：天子答〈頍弁〉也。

青蠅：諷王勿近小人也。

魚藻：朱仲晦所謂天子燕諸侯，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。

采芣：天子答〈魚藻〉也。

黍苗：南行之士答〈采芣〉也。

隰桑：惜賢者之遯世也。

這十四首詩，《詩序》都認為是「刺幽王」之作，在謀埠的解釋之下，有農事詩、燕飲詩、社會詩、招賢詩，類別繁多，詩篇本身的生命也完全顯現出來。謀埠所以有如此顯著的成績，除了他藉詩篇字句來探尋詩旨的方法外，朱子解釋這些詩篇時，對《詩序》大都已持反對或修正的態度，遵循此一方向繼續思考，自較易看出成績來。

《詩故》一書解釋詩旨如果有較新的見解，大概可以從上文所舉的《鄭風》和《小雅》的部分看出來。

七、糾毛《傳》訓詁之誤

毛《傳》是現存最早的《詩經》著作。歷代《詩經》學家解《詩》，往往根據毛《傳》。宋人反《詩序》，解說詩旨與《詩序》出入者不少。惟有關字、詞的解釋，大抵仍舊沿用毛《傳》。足見該書在《詩經》解釋學上的權威地位。毛《傳》時代雖早，地位雖高，有關字詞、名物等之解釋，也不能全無疏漏。這點，楊慎已略有指陳。謀埠《詩故》糾毛《傳》之失者近二十條。茲分字詞與名物兩類舉例加以說明：

（一）字詞方面

1. 周南螽斯：「宜爾子孫，振振兮。」毛《傳》：「振振，仁厚也。」鄭《箋》：「后妃之德，寬容不嫉妬，則宜女之子孫，使其無不仁厚。」可見鄭玄也贊同仁厚之說。朱子《集傳》：「振振，盛貌。」謀埠以為：「振振，言其衆盛，非仁厚之謂。」（卷1，頁3）可見謀埠不從毛《傳》的仁厚說。

2. 周南兔罝：「肅肅兔罝，施於中逵。」毛《傳》：「逵，九達之道。」朱子《集傳》沿用毛《傳》之說。謀埠以為：「兔道爲逵，往來有常。所謂中逵，自是兔逵，非九達之逵也。」（卷1，頁4）

3. 邶風柏舟：「憂心悄悄，愠于羣小。」毛《傳》：「愠，怒也。」

朱子《集傳》沿用毛《傳》之說。謀埠則以爲：「慍處憂、戚之間，《記》稱『憂斯慍，慍斯戚。』是已。以怒訓慍，則悞矣。」（卷2，頁2）謀埠所引之《記》，是《禮記》的《檀弓》。他認爲慍是憂、戚之間的一種心理狀態，不是「怒」。

4.小雅無羊：「爾羊來思，矜矜兢兢，不騫不崩。」毛《傳》：「矜矜兢兢，以言堅彊也。」謀埠以爲：「羊性護前，日夕則競先爭歸，陵矜不讓，故曰矜矜兢兢，非堅彊也。」（卷6，頁14）謀埠從羊的本性來加以分析，認爲「矜矜兢兢」，應是指羊羣爭歸，不肯相讓的樣子。

5.大雅生民：「取羝以較，載燔載烈。」毛《傳》：「較，道祭也。」朱子《集傳》採毛《傳》之說，謀埠以爲「較與祓通，『取羝以祓』，謂以犧、羊祀方社田祖，祓除螟蠶、蝨賊之害，故曰：『以興嗣歲』，皆農事也。若謂較爲道祭，大不然矣。」（卷9，頁7）謀埠從篇中有「以興嗣歲」之句，認爲「較」不應是「道祭」。因解釋爲「道祭」，則與農事並不相關。

6.周頌雝：「既右烈考，亦右文母。」毛《傳》：「烈考，武王也。」謀埠以爲：「武王克商，歸祀於周廟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之事。此其樂章也。皇考、烈考，皆謂文王也。周公相成王，乃尊諡文王而諱昌，此云『烈考』，又曰：『克昌厥後』，知爲武王時詩也。」〈雝〉是武王克商回國後祭祀於祖廟的詩，所以「皇考」、「烈考」，都應指文王，而非武王。

（二）名物方面

1.鄘風牆有茨：「牆有茨，不可埽也。」毛《傳》：「茨，蒺藜也。欲埽去之，反傷牆也。」朱子《集傳》：「茨，蒺藜也。蔓生，細葉，子有三角，刺人。」朱子《集傳》是對毛《傳》的補充解釋。謀埠以爲：「茨謂茅之有次第者，所以覆牆也。〈梓材〉：『既勤垣墉，其塗墍茨。』

卽是茨矣。毛《傳》、朱《傳》，並謂蒺藜，何其謬哉！」（卷2，頁8）他認爲「茨」就是《尚書·梓材》：「其塗墍茨」的「茨」，而非蒺藜。

2. 秦風駟驥：「輶車鸞鑣，載獫歇驕。」毛《傳》：「獫，歇驕，田犬也。長喙曰獫，短喙曰歇驕。」謀璋以爲：「載獫歇驕，謂車載獫、獬二犬，以歇息之。非獫、獬，皆田犬也。《詩緝》稱田犬長喙，而短喙者非田犬也。毛《傳》誤耳，《爾雅》所載，又後世因毛《傳》而竄入之者也。」（卷4，頁8）按：「歇驕」，《說文》引作「獬獬」，是一複音詞，且確爲犬名。謀璋之說並不確。

3. 豳風七月：「春日載陽，有鳴倉庚。」毛《傳》：「倉庚，離黃也。」謀璋以爲：「倉庚，青鳥司啓者也，以春分鳴。今之百舌鳥也。《傳》以爲離黃，則誤矣。」（卷5，頁8）按：「倉庚」，卽今之黃鸝。裴善賢教授有〈詩經黃鳥倉庚考辨〉一文，曾詳加考辨。^④ 謀璋以爲「百舌鳥」，並不確。

4. 王風大車：「大車檻檻，毳衣如綦。」毛《傳》：「大車，大夫之車。」「毳衣，大夫之服」鄭《箋》：「古者天子大夫，服毳冕以巡行邦國。」朱子《集傳》沿用毛、鄭之說。謀璋以爲：「大車，牛車，任載者。非大夫之車也。毳衣，毛褐。將車者之服，非毳冕。」（卷3，頁3）謀璋以「大車」爲牛車，「毳衣」爲將車者之服，這與他所認定的詩旨有關。他認爲〈大車〉一詩，是「商者之婦寄其夫也。」既如此，所謂「大車」就不得爲「大夫之車」；「毳衣」就不得爲「大夫之服」。

5. 豳風破斧：「既破我斧，又缺我錡。」毛《傳》：「鑿屬曰錡。」謀璋以爲：「釜之有足者曰錡，無足者曰鉢，皆炊食之具。非鑿屬也。錡

^④ 裴先生之文，原載於《孔孟學報》第27期（1974年4月），頁99-108。後收入裴氏著：《詩經研讀指導》（臺北：東大圖書公司，1977年3月），頁98-110。

之爲釜，既見〈采蘋〉，鉢雖無訓，可以類求矣。斧、斨、錡、鉢之破缺，明從役在東之久也。」（卷5，頁10）按：〈采蘋〉有「于以湘之，維錡及釜。」毛《傳》：「錡，釜屬。有足曰錡，無足曰釜。」在〈破斧〉一詩的「錡」字，則又說是「鑿屬」。同一詞，前後解說不一，謀埠則統一解釋，認爲是坎食之具。

就上述謀埠所考辨之字詞、名物加以分析，謀埠確想從詩篇本文的語言脈絡去探尋各字詞、名物的本來面目。雖然有些解釋並不正確，甚至比毛《傳》的解釋更不合本義，但他希望藉字詞、名物的理解，來探求正確的詩篇旨意，此點較之宋人欠缺訓詁根據，任意解釋，自是學風轉趨謹嚴的一種先導。

八、對宋儒詩說的批評

宋人說《詩》，自歐陽脩《詩本義》、蘇轍《詩集傳》自創新說以後，對漢學傳統逐一加以批判，至朱熹則集各種新說之大成。其三傳弟子王柏則承朱子遺說刪汰所謂淫詩三十一篇。謀埠面對宋人說詩的傳統，有認爲說法正確，而加以採用者，如《鄭風·緇衣》：「緇衣之蓆兮，敝，予又改作兮。」謀埠說：「蓆有四訓，毛《傳》訓大，《韓詩》訓儲，許慎訓爲廣多，唯朱《傳》訓爲安舒者得之。」（卷3，頁4）又如《小雅·魚藻》的詩旨，謀埠即採用朱子之說，云：「朱仲晦所謂天子燕諸侯，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。」（卷8，頁7）即是。至於像淫詩說、鄭聲淫、笙詩有聲無辭等問題，謀埠的看法與宋人都有相當的出入。

（一）淫詩說

謀埠對於朱學派把鄭、衛之詩列爲淫詩，並未有太大的反感。獨對王柏把《召南·野有死麕》列入淫詩而加以刪削，則大爲不滿，他說：

二南之詩，有美而無刺，其述風化事行，往往在乎景象之間，不因

言語文字而盡之。學詩者所當知焉。俗儒不通斯旨，至謂此詩爲淫奔而欲刪之，如其愚，如其愚。（卷1，頁10）

謀埠對二南的看法，基本上承襲《詩序》以來的傳統，以爲是得文王教化之詩。既被文王之教化，所以這些詩都是「有美而無刺」，亦即根本無可刺之事，何來刺詩？且謀埠認爲二南是藉「景象」來傳達「風化事行」，而不是用「言語文字」表達出來。既如此，就不會藉《野有死麇》來傳達其諷刺之意。俗儒（指王柏）不了解這一層的意義，應加以批評。

其實，淫詩說根本是宋人道學思想下的產物，不但二南沒有淫詩，即鄭、衛之詩，也非淫詩。此點前人辨析已明，可不贅。¹⁵

（二）鄭聲淫

《論語·衛靈公》：「放鄭聲，遠佞人；鄭聲淫，佞人殆。」由於孔子對這幾句話並未詳加解釋，後人把「鄭聲淫」和《鄭風》淫牽合來談，亦即鄭聲即《鄭風》，所謂「淫」，是指淫邪。這一問題，朱熹和呂祖謙曾經論辨過。朱子以爲聲即是詩，所以「鄭聲淫」就是《鄭風》淫邪不正。呂祖謙以爲「鄭聲淫」並不表示《鄭風》淫。因爲《詩經》既經聖人編訂過，又說是「思無邪」的，不但配的是雅樂，所錄的也都是正詩。即使詩中有涉及穢亂，也是詩人用無邪之思來敘說淫邪之事，聖人是要用淫詩來作爲反面教材。此事是非曲直實難加以斷定，可說是《詩經》研究的一「公案」。

謀埠認爲：「鄭詩二十一篇，始武、莊，終忽、突，皆國事也。其它亦多賢人、君子之詞。」（卷3，頁4）由於有這種認定，他對宋人以《鄭風》皆淫詩的觀點，就很不以爲然，他說：

宋世之儒誤釋「放鄭聲」一語，遂去〈小序〉，盡以淫奔目之。夫

¹⁵ 可參考李家樹撰：〈宋代淫詩公案初探〉。收入李氏著：《詩經歷史公案》（臺北：大安出版社，1990年11月），頁83-112。

詩非聲也，聲非詩也。措諸文詞是爲詩，被諸管絃、音律是爲聲。
鄭音好濫而淫志者，故仲尼放之，豈〈緇衣〉、〈仲子〉諸詩乎？
(卷3，頁4)

謀埠認爲宋儒誤解孔子「放鄭聲」的話，而把「聲」和「詩」等同起來，以爲「鄭聲淫」即「鄭詩淫」。其實，寫成文詞的是詩，用音樂演奏的就是聲，兩者不可混爲一談。鄭聲因爲「好濫而淫志」，所以孔子才要「放」它！謀埠以爲這一類「好濫而淫志」的鄭聲，也許就是指〈緇衣〉、〈將仲子〉。

此一問題歷來糾纏不清，不過可以理解的是，謀埠認爲孔子所說的「鄭聲淫」，並非《鄭風》之詩，恐很難有佐證。如從「淫」字在先秦的用法加以分析，則當時所謂「淫」多指「過分」、「過度」而已。孔子的「鄭聲淫」，只不過說它不合雅正的標準而已。如從這一角度來思考問題，當更合孔子本意。

(三) 笙詩問題

笙詩六篇到底有沒有歌辭？〈華黍〉和〈由儀〉序下說：「有其義而亡其辭」。後人對這一句話有不同的理解。鄭玄以爲：「孔子論詩，雅頌各得其所，時俱在耳。篇第當在於此。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，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。至毛公爲詁訓傳，乃分衆篇之義，各置於其篇端云。」鄭玄的話有幾點可注意：其一，他認爲孔子編輯《詩經》時，六篇《笙詩》俱在。各篇的順序即在〈魚麗〉、〈南山有臺〉之後。其二，各篇因戰國及秦之亂而亡佚，僅留下各篇的序。序所以能傳下來，是因爲和其他各篇之序合爲一編。其三，毛公作《故訓傳》，分割各篇之序，放在各詩篇之前，所以才有有序無詩的現象。

鄭玄的解說可說相當合理。朱子把〈南陔〉等三篇，擺在〈杕杜〉之後，〈魚麗〉之前，把〈由庚〉擺在〈魚麗〉之後，〈崇丘〉擺在〈南有

嘉魚〉之後，〈由儀〉擺在〈南山有臺〉之後。且有他自己的看法，他說：

〈南陔〉以下，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，然曰笙、曰樂、曰奏，而不言歌，則有聲而無詞明矣。（《詩集傳》，頁109）

他認為《儀禮·鄉飲酒禮》提到：「樂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。」又：「笙《由庚》、……笙《崇丘》、……笙《由儀》。」《燕禮》提到：「奏〈南陔〉、〈白華〉、〈華黍〉。」可見〈南陔〉等三篇僅能用於樂、笙、奏。既如此，就無歌辭可言。謀瑋則以為：

朱仲晦以為三篇有聲而無詞。夫無詞安得而有聲，三篇之名何自而起乎？〈由庚〉、〈崇丘〉、〈由儀〉三篇皆亡也。（卷6，頁4-5）

謀瑋認為詩篇之名，是因詩篇之詞而來，既無詩詞，怎會有篇名？可見並非朱子的「有聲無詞」。而是亡佚的緣故。

至於朱子解釋詩篇字句的疏失，謀瑋也提出加以訂正，如：

1. 豳風東山：「伊威在室，蠨蛸在戶。」朱子《集傳》：「伊威，鼠婦也。室不掃則有之。」謀瑋則以為：「伊威，長角長股背窪而短，斑色有文，常依室中隈輿而生。今俗謂之潛龜，非鼠婦也。」（卷5，頁10）

2. 豳風東山：「熠燿宵行。」毛《傳》：「熠燿，燐也。燐，螢火也。」朱子《集傳》：「熠燿，明不定貌。宵行，蟲名，如蠶，夜行，喉下有光如螢也。」謀瑋則以為：「熠燿宵行，謂螢也。夜中見光不見螢，故曰熠燿。非有所謂如蠶之蟲也。」（卷5，頁10）

3. 大雅生民：「履帝武敏歆。」毛《傳》：「帝，高辛氏之帝也。武，迹。敏，疾也。從於帝而見於天，將事齊敏也。歆，饗。」從毛《傳》的詮釋可知，帝是指高辛氏的帝嚳。毛氏以為姜嫄跟隨著丈夫帝嚳，行事敏捷地一起去饗神。鄭《箋》則說：「帝，上帝也。敏，拇也」……祀郊禘之時，時則有大神之迹，姜嫄履之，足不能滿，履其拇指之處，心體歆歆

然，其左右所止住，如有人道感己者也。於是遂有身，而肅戒不復御，後則生子而養長之，名曰棄。舜臣堯而舉之，是爲后稷。」（《毛詩鄭箋》，卷17，頁1下）鄭玄以爲祀郊禘之時，姜嫄踏到上帝的腳迹，心怦怦然動，就懷孕生了后稷。朱子《集傳》沿襲了鄭玄的說法，以爲：「姜嫄出祀郊禘，見大人迹而履其拇，遂歆歆然如有人道之感。」謀埠對此事的看法是：

姜嫄者，帝嚳之世妃，從帝祈子郊禘，其精誠敏於感神，故曰：「履帝武敏歆」。俗儒誤釋，遂謂：「見大人迹而履其拇」，妄誕甚矣。（卷9，頁6-7）

謀埠以爲姜嫄跟隨帝嚳祈子於郊禘，此種精誠之心感動了神明。而俗儒（指朱子）卻釋爲「見大人迹而履其拇」，可說妄誕已甚。其實，朱子之說乃沿襲鄭玄而來，謀埠在批評朱子之前，應先責備鄭玄才對。

謀埠對宋儒詩說的批評，當然以朱子及其弟子爲主。所批評的淫詩說、鄭聲淫、笙詩等問題，皆《詩經》研究中的棘手問題，謀埠之說當然不是定論。不過，可以看出宋學家之說已不是金科玉律，是可以批評檢討的。

九、《詩故》所反映的朱氏思想

《詩故》一書除了上文所述勘正《詩經》篇名和詩句之誤、申釋和批評《詩序》、糾正毛《傳》訓詁之誤、批評宋儒的詩說等幾個方面的成就外，也可以看出謀埠的思想傾向。此可分兩點來討論：

（一）孔子寓教化於刪詩

歷來學者對孔子是否刪詩，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但因孔子曾說過：「吾自衛反魯，然後樂正，雅頌各得其所。」大家也就承認孔子曾改編過《詩經》。他既認爲《詩經》三百篇是「思無邪」的，何以《鄭風》

之詩會被保存下來？爲何不把它刪去？古代的《詩經》學者以爲不善之詩，也可以作爲懲惡勸善之用，所以《詩經》中的詩是善惡並存的。謀埠承繼了這種觀點，認爲《詩經》中所以存刺詩，是爲了教戒之用的。如《衛風·氓》序：「刺時也。」謀埠申釋說：「刺淫奔者失身也。」這樣的詩篇，孔子爲何要收錄？他說：「孔子錄之，所以昭世戒者深矣。」（卷2，頁13）

同樣地，《魏風》七篇，孔子爲何要收錄？他也說：「魏者舜、禹之故鄉，其民俗儉約勤謹，有先王之遺風焉。是可尚也。」（卷4，頁1）因爲魏地是古聖王的故鄉，有先王遺風，《魏風》正是這種「儉約勤謹」民風的反映，所以值得錄進去。又如《秦風·駟驥》序：「美襄公也。」謀埠以爲這首詩並不是在美襄公，因爲：

襄公以攘西戎之功，受平王岐、豐八百里之地，不聞延訪遺老，講求政教，而惟田獵是務，所同行者公之媚子也。所從禽者獵狗也，以鸞車而載田犬，所尚可知也。（卷4，頁8）

襄公的行爲既如此，可見這首詩是刺詩。孔子何以要收錄？謀埠說：「蓋譏之，非美之也。」（卷4，頁8）可見孔子是要以譏刺之詩來達到鑒戒的作用。

又如《小雅·巧言》序：「刺幽王也。」謀埠以爲是在詰責讒人褒姒的詩。因爲幽王聽信褒姒的話，「廢嫡立庶，嬖妾黜后，以致父子相謀，宗社覆滅，自古禍亂，莫甚于此。」（卷7，頁7）此詩可說是大不善之詩，謀埠以爲：「仲尼錄詩，不一而足，厥有由哉！」（同上）孔子的理由是什麼？依照謀埠的理解，自是爲了教化。

謀埠既認爲孔子整編《詩經》時，所以要收編某篇，皆有其教化的意義在內，所以他雖不一定相信《詩序》所定的詩旨，但他在重定詩旨時，由於此一觀點橫梗心中，所以仍舊拋脫不了美刺說的陰影。《詩故》一書

的侷限也在這個地方。

(二) 以尚賢使能治國

以賢人治國本是為政最粗淺的道理。《詩經》的部分詩篇也反映了為政者需才孔急的要求，如《小雅》的《菁菁者莪》、《鶴鳴》等皆是。謀璋綜理藩政三十餘年，也可說是一名為政者，因此，對任賢使能的為政之道也特別致意再三。《詩經》中只要是諷刺任用小人，廢棄賢人的詩篇，謀璋一定把尚賢的道理再三申述，如《魏風·園有桃》序：「刺時也。」謀璋申釋說：

魏國徧急，不能任賢，日就侵削，故刺之。……魏國雖陋，苟得賢人治之，亦當不至侵削。今之侵削，由不善樹人故也。（卷4，頁2）

魏國於魯閔公元年為晉獻公所併。《魏風》七篇大多是亡國前的作品，所以多怨怒之音。謀璋認為魏國所以步步走上亡國的命運，是因為「不能任賢」、「不善樹人」所致。又如《小雅·節南山》序：「家父刺幽王也。」所以要刺幽王，是要「刺不平」。何以不平？是因為幽王「尊寵姻亞，斥遠君子，為政偏頗不均平也。」（卷7，頁1）詩中雖提到幽王也會加惡怒於小人，但因小人「包承之巧，足以自解，是以小人終不可去。小人不去，君子不得進矣。」（卷7，頁1）又如：《小雅·小旻》序：「大夫刺幽王也。」何以要刺？是因為「謀國者顛倒是非，踰至覆亡也。」謀璋非常感慨地說：「舍哲謀肅乂之士，而唯小人是從，將如流泉之決，不復可收，相與淪陷而已。」（卷7，頁4）幽王在位十一年，何以刺詩紛至沓來呢？謀璋認為是因夫婦、父子之間的倫理，已由小人從中挑撥，敗壞不可收拾所致。也就是君子道消、小人道長，腐蝕國本，以致不可收拾。

又如《大雅·桑柔》序：「芮伯刺厲王也。」厲王所以應刺，是因為昏庸無能，讓小人顛倒是非，以致民風敗壞。謀璋說：

以此貪人，唯聚斂是事，……無論君子小人，皆被其害。然良人猶能用善道以自勉；不順之人，必發揚其陰賊而思畔矣。今不用其良，乃謂良人爲悖，何哉？（卷9，頁14）

謀瑋詰問何以不用賢人，且以賢人爲仇？

此外，謀瑋也特別注意到君民關係的和諧。他認爲兩者間應是一種相對待的關係，而不是一種單向的倫理。此點謀瑋在《小雅·漸漸之石》篇已加以說明，他說：

在上者能恤人勞苦，而慰拊之，則在下者忘其勞苦。此詩自述勞苦，則在上者不能恤拊其下，可知矣。（卷8，頁13）

謀瑋綜理藩政三十餘年，頗得宗人的愛戴，這一觀點既是他處事的心得，也是他處理政事的最佳準則。

十、結 論

朱謀瑋的《詩故》，可以說是明中葉起漢學逐漸受到重視學風下的產物，此書之出現，約有下列數點意義：

其一，從上文的分析，我們可以理解，《詩故》雖然錄了《詩序》的首句，但並不全部遵循《詩序》之說。他所以要錄《詩序》，是要人回到《詩序》的釋經傳統來重新思考。重新檢討此一系統的有效性。這必是謀瑋沈潛古典之學數十年後，確認較平實可行的路。從謀瑋的作法，我們可以看出漢學的勢力正逐漸在擴大中，而統治數百年，以官學自居的宋學已受到相當的挑戰。

其二，《詩故》寫作的動機，是要通詩篇的旨意，來探尋詩人作詩的本意。可是謀瑋所面對的是一個近兩千年的《詩經》解釋傳統。這傳統包含：詩篇和詩句本身在傳鈔過程中產生的問題，《詩序》釋詩觀點是否正確？毛《傳》訓詁有否疏失？宋人的詩說是否可取？這些問題，謀瑋皆一

一提出加以檢討。經檢討的結果，發現：

1.《詩經》的篇名和詩句經傳鈔結果有不少訛誤，甚至有錯簡的現象，謀埠不但指出錯訛的所在，也解釋錯訛形成的原因。

2.《詩故》雖錄了《詩序》首句，但贊成其說者僅 183 篇，不贊同者有 120 篇，修正其說者有 2 篇。在不贊同的部分，以《鄭風》和《小雅》為最多。這兩類詩的《詩序》，宋人早已提出修正，甚或反對。謀埠在此一基礎下，遂有較寬廣的思考空間，所論定的詩旨，自不受前人拘囿。

3.謀埠對毛《傳》中字詞、名物等方面訓詁的疏失，也提出辨正。他的辨正，並不完全正確，但可看出想從訓詁中探求字的確切意思，進而確定詩旨的用心。宋儒對漢人的詩說深致不滿，謀埠對朱子及其弟子的淫詩說、鄭聲淫、笙詩等問題，也有自己的看法。

可知，《詩故》既不偏袒漢學，也不刻意攻擊宋學，對漢、宋《詩經》學家，都有客觀的評斷。是宋學轉變為清代漢學的過渡橋樑。能有此體認，研究《詩故》才有積極的意義。

A Critical Study of Chu Mou-wei's *Shih ku* 詩故

Lin Ch'ing-chang

The study of *Shih ching* traditionally had revolved around the canonization or the dismissal of the Preface. Chu Hsi's dismissal of the Preface in *Shi chi-chuan* was upheld until mid-Ming—a scholarly practice altered only by the appearance of Chu Mou-wei's *Shih ku*. Besides rehabilitating the first line of the Preface as the basis of explicating the meanings of the poems, Chu Mou-wei and his *Shih ku* can also be credited with the following intellectual achievements: (1) After promo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Preface, Chu went on to provide important new readings of more than a hundred poems—some perhaps inspired by Sung scholarship; (2) Chu made numerous textual rectifications of the titles and lines of the *Shih ching* poems and elaborated on or criticized the views of the Preface as he saw fit; (3) Chu did not hesitate to criticize the predominant Sung views on sensuality, eroticism, and musicality in various poems; (4) Chu also came up with his own ideas about the functions of poetry. In sum, *Shih ku* is a bridge between Sung interpretation and Ch'ing philology, marking the shift of research paradigms.